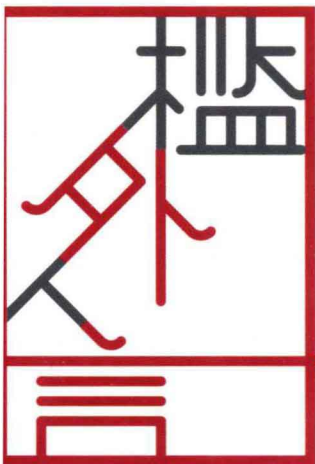




—— 学习建筑理论的一些浅识

张钦楠 著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张钦楠 著



学习建筑理论的一些浅识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槛外人言——学习建筑理论的一些浅识 / 张钦楠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112-15683-2

I. ①槛… II. ①张… III. ①建筑学 - 普及读物

IV. ①TU-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8354号

本书是作者在从事建筑工程设计与设计管理 60 余年工作中的学习心得、经验总结。作者从建筑的理论、历史、建筑师和职业建设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对建筑理论, 作者从建筑的功能层次论证了建筑设计与一般工程设计的原则区别、建筑师应当重视的功能范畴、当前妨害建筑创作繁荣值得注意的事项, 并从方法论角度分别阐述了阅读城市与建筑的有效途径。对建筑历史, 作者提出了对于中国建筑史的风格演变分期、从古至今中国建筑及其文化特征的观点; 对于建筑师, 作者认为应该重视建筑师和他们的业绩, 只讲建筑, 不讲其建筑师的建筑史是不完整的。对于职业建设, 作者提出应该建立一个保护建筑师社会地位、权利和责任的职业制度。本书对于当前的建筑设计、城市建设工作提出了许多务实、积极而富于创意的见解, 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值得建筑师、城市规划师, 理论工作者及相关专业在校师生拨冗一读。

责任编辑: 董苏华

责任校对: 王雪竹 刘 钰

槛外人言

——学习建筑理论的一些浅识

张钦楠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5⁵/₈ 字数: 160千字

2013年10月第一版 201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45.00元

ISBN 978-7-112-15683-2

(2345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槛外人言

——学习建筑理论的一些浅识

张钦楠 著

目 录

导言

第一章 理论

- 009 第一节 建筑是什么？
- 016 第二节 建筑设计的独特性
- 019 第三节 建筑的几个基本范畴
- 025 第四节 阅读城市的基本方法：标志与母体
- 035 第五节 阅读建筑的基本方法：现象学方法
- 042 第六节 中国古代的环境学——读“风水”的一些体会

第二章 历史

- 049 第一节 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的三大源泉
- 055 第二节 中国文人建筑的传统
- 097 第三节 中国的建筑史能否区分风格时代？
- 102 第四节 什么是中国最宝贵的建筑传统？
- 110 第五节 如何理解和评价欧美的后现代主义？

116	第六节 如何理解当今的非理性建筑?
-----	-------------------

第三章 建筑师

130	第一节 建筑史与建筑师
-----	-------------

137	第二节 寻找中国古代建筑师
-----	---------------

第四章 职业建设

147	第一节 建筑师职业的形成
-----	--------------

155	第二节 我国建筑师职业建设的一些片段
-----	--------------------

158	第三节 职业主义的含义
-----	-------------

161	插图目录
-----	------

164	主要参考文献
-----	--------

166	索引
-----	----

174	后记
-----	----

导 言

当我进入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一切都显得十分自然，只有一件怪事：就是我何以和建筑学打起交道？

我从小有些小聪明，在学校里书读得不错，数理化都在 90 分以上。我的志向是当一名工程师。我看过一部名为《苏伊士》的电影，就想当里面的主角。我的抱负是修造一座横跨太平洋、连接中美的大桥。

我果然在 17 岁进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土木工程系。然而，就在这时，我发现有一门学科比土木工程学要“吃香”，就是建筑学。

在哈佛大学学土木工程的学长杨式德告诫我：“我们学土木的，就是土里土气、木头木脑”。我忽然大彻大悟，才发现自己缺乏艺术细胞，不会绘画，不懂音乐，不会跳交际舞……与建筑学的学生相比，他们穿得帅气，举止优美，谈吐高雅，站在一起，自感矮了一截。

毕业后回国，进了上海的华东建筑设计院，与建筑师们平起平坐，慢慢地感受又起了变化。那时全国都忙着工业化建设。厂房建筑都套苏联模式，建筑师不过是“穿衣戴帽，配几个生活间”；住宅建筑强调“经济”，套用标准设计；只有在少量公共建筑中，建筑师才有机会有所发挥，运动一来，又首当其冲受到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我又觉得他们比我“矮了一截”。

从 1952 年到 1979 年，我先后在上海、北京、西安、重庆等地的建筑设计院工作（其中有 3 年在国家机关，觉得自己不适宜一出校门就进机关，于是经领导批准，又回到设计院），从一名技术员到工程师、室主任、主任工程师、副院长。我接触了建筑设计和设计管理的全过程，开始理

解建筑设计团队就像一个交响乐团，有各种乐器的能手，但必须有一个指挥。这位指挥的音乐造诣不一定高于其他乐师，但是他的指挥作用却是客观需要，不可缺少。在建筑设计团队中，这个指挥就应当由建筑师担当。

1980年，国务院成立国家建工总局，我从西安调到北京。主持设计局的是王挺。他与我不于20世纪50年代在建工部设计总局共事过。他见了我，第一句话是：

“老张，我们的任务是重新振兴建筑设计。”

经过“文革”的动乱，建筑设计行业遭到巨大的破坏：各大学的建筑系都被撤销，权威建筑师及其作品遭到多种批判，建筑理论荡然无存，“建筑创作”的提法也被取消（改为“建筑设计”），主管部门甚至还决定取消“建筑师”的职称，成为“工程师”的一个分支。

王挺任命我为技术处长（后来又被提升为副局长、局长），给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广州召开各大设计院总建筑师、总工程师参加的技术会议，讨论制订振兴建筑技术的计划。

王挺是位不知疲劳的好干部，不久因心脏病去世，接任的是龚德顺。他一上台，就邀请各地名建筑师到敦煌开会，议题就是建筑创作的理论。会上发言热烈，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筑风格”争论激烈。我第一次意识到建筑理论的重要性，下决心要学习它。

鼓励和指导我学习建筑理论的导师很多，最突出的有：

——戴念慈：在万里副总理直接提名下，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城乡建设部的副部长，是我的顶头上司。我经常去他的办公室汇报请示工作，谈完工作以后，他总要留我继续谈论其他问题，主要是建筑理论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维护“建筑师”称号的努力，他不惜劳累，东奔西走，向部内外主管部局解释建筑师与工程师在职业上的不同。结果，人事部门同意在建筑系统内保持建筑师的职称。虽然还是“矮人一截”，但总算

留下了一条细线。

戴老鼓励我学习建筑理论，愿意耐心地听我讲自己的学习心得和观点。是他推举我到建筑学会担任秘书长。后来，他自己成立“小而精”的建学建筑设计所，又要我帮他张罗。

——龚德顺：他是戴老提名到设计局担任局长的。我作为他的副手和继承人，配合默契。我们在办公室面对面相坐，除工作以外，就海阔天空地无所不谈，特别是敦煌会议上争论热烈的一些建筑理论问题。他鼓励我写文章，我后来先后著译十来本书和百来篇文章，应当归功（“归罪”？）于他。

——汪坦：他在“文革”后、人们还心有余悸之际，挺身而出，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主编《建筑理论译丛》，其中他找我（可能是听说我在美国念过书）翻译英国 G·斯科特的《人文主义建筑学》。我发现斯科特和我一样，都不是建筑学“科班出身”，于是斗胆承担，才接触到像哥特、巴洛克风格等等术语，引起了我对建筑史的兴趣。于是和几位同业集体翻译了美国 K·弗兰姆普敦的《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一发而不可收。

在导师们的鼓励下，我开始系统地学习建筑理论。但是，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找到一部完整的、综合的建筑理论著作。我的学习都是单题的：先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再找相关资料，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答案。

例如：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设计”作为一个解题过程，在建筑设计、工程设计、工艺设计、产品设计上有什么区别？我学习了 H·A·西蒙（诺贝尔奖获得者）写的《人工科学》一书，认为工程设计属于确定性问题，而建筑设计则属于“模糊性”（甚至是“狡猾性”）问题，前者可以有唯一的最优解，而后者却可以有若干个优化解。这是由建筑设计的本质决定的，从而也决定了二者设计方法的不同。

再如：对于“适用、经济、美观”，我们如何理解“经济”这个概念？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把“经济”与“造价”等同起来，以为造价越省越“经济”。我带了这个问题回过来学习我在大学里所学的经济学，其教材又是一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P·萨弥逊写的（而且是他课堂上讲的）《经济学》。他所阐释的经济学原理，用一句话可以概括：

“经济学研究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人之间进行分配。”

我又结合学习了有关“全寿命费用（LCC）分析”和“价值工程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于是理解到我们大量的“节约”型建筑实际上是“低标准、高消耗、高污染”的。

我就这样用“问—读—思—答”的方式涉猎了建筑学的各个理论问题。与此同时，我阅读了 S·柯斯托夫的《建筑史》和刘敦桢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加上自己参与翻译的 K·弗兰姆普敦的《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对中外建筑史有了粗浅的了解。

在阅读建筑史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古代建筑师的“缺位”。柯斯托夫除了《建筑史》，还写了一本姐妹篇——《建筑师》。我从中理解到要懂得建筑学理论，就必须了解建筑史，要了解建筑史，又必须了解创造建筑史的建筑师，同时要了解建筑师职业的演变和其特点。理论—历史—人物—职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国历史上有极其丰富灿烂的建筑，但是在以上四个方面，我们都面临极其繁重的建设任务。

1990年代初，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委托建设部总工程师许溶烈先生主编一套《当代土木建筑科技丛书》，他向我约稿，我就不揣冒昧地写了一本《建筑设计方法学》，实际上是我这几年学习建筑理论的笔记，以期获得批评。可惜的是，它 1995 年出版时，敬爱的戴老已经过世，但我意外地得到张开济老先生的鼓励。此后，我和张老多次接触，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很多（此书在 2007 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再版）。

改革开放以后，我又重新与国外的亲友取得联系，在工作上也逐步发展了与国外建筑师的沟通。1983年，应澳大利亚文化委员会的邀请，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金瓯卜委派施宜、刘开济和我（当时在建设部设计局）三人去参加其学会的年会。我经过建设部批准与澳大利亚文化委员会达成了一个交流协议，每年指派一名中国建筑学者去澳大利亚进修，同时邀请澳大利亚方派建筑师来华讲授设计经验。从那时开始，中外建筑师的互相交流就不断发展。

1988年，国家机构再次调整，戴老问我是否愿意去建筑学会。他对我提出两点希望：一是繁荣国内的建筑学术活动；二是发展与国际建筑界的关系。我们在国际人才交流中心的支持下，每年邀请3—4位外国知名建筑师来华举行学术讲座。通过这些交往，我结识了不少国外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有：

——肯尼斯·弗兰姆普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建筑理论家，提倡批判的地域主义。我首次见到他就在1983年澳大利亚那次会上。事后，我根据刘开济的推荐，组织翻译了他的经典著作《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并且邀请他来北京和上海讲学。1999年，他应我们邀请，配合国际建筑师协会第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的召开，除了与吴良镛教授在大会上做主题报告外，还帮助我们编撰了一部10卷本的《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其中选载了世界10大区一个世纪以来的1000项代表性建筑作品。这套丛书荣获国际建协颁发的建筑教育与理论奖（让·屈米奖）荣誉奖。我们的交往延续了近30年，我视他为我的良师益友，他则称我是“开辟走向中国道路”的人。

——豪格·格鲁斯堡，阿根廷国家艺术馆馆长，作家。首先是经过刘开济的推荐，我们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年度建筑学术讲座，他由此爱上了中国（以及中国的糖醋排骨），反过来他又邀请刘总和我去阿根廷参加他们的国际建筑论坛。我们到达以后，才惊奇地发现这个论坛的“盛

大”：来自欧、美和日本的几十位建筑“明星”大师济济一堂，白天，每天都有十来位大师介绍自己的最新作品，千人的礼堂坐满了建筑师和学生，气氛热烈；晚上，这些贵宾们相聚一堂，联欢到深夜。格鲁斯堡还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给来自美、英、法等6个国家各一位来宾授予“荣誉市民”称号，没想到把我也作为来自中国的嘉宾列入其内（应当是给刘总的）。此后他又几次邀请我们去他每隔2—3年召开一次的讲坛。我先后去了3次，在其中结识了多个大名鼎鼎的建筑人物，直接听取了他们的许多创作观点。在1999年，他又帮助我们编撰了《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拉美卷》。此后，我们很少来往，我从网上得知他在2012年2月去世，发去唁电竟因地址有误而被退回。

——安东·格鲁姆巴，法国建筑师。我是在阿根廷的国际建筑论坛上结识他的。他在大会上介绍了他在巴黎东北部进行旧城改造的经验，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对自己改造区中每栋建筑进行了实地调查，分别确定了“拆、改、留”的对策，而不是我们所热衷的“推平头”的做法；同时，他在对巴黎东北部（比较贫困的区域）老建筑进行“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建住宅的形态进行了创新设计，改造后保持“既老又新”的面貌。经戴老同意，我们邀请他到中国建筑学会在泉州召开的年会上作了学术报告，得到与会者（包括戴老、李道增教授等）的高度肯定。会后，我又陪他在北京访问了一天。除故宫、天坛等外，还参观一个新的住宅区。这时，他看到一个住宅楼单元门口的电灯开关装歪了，就严肃地向我提出指责：

“你们的建筑师怎么可以容忍这种施工？”

我只能苦笑地回答：“中国建筑师无权干预这类事。”

他摇头表示无法理解。

一年以后，我有机会去巴黎开会。他热诚地接待我，用一整天的时间带我去看他在巴黎东北区所做的旧城改造，并参观了一些新住宅区和

一个卫星城。晚上，他和夫人招待我在他于市中心奥斯曼式公寓顶层的居所中吃了顿简美的晚餐，饭后我们在屋顶阳台上一同观赏巴黎的夜景，度过了极其丰富和愉快的一天。

以后，我和格鲁姆巴就没有来往。最近，我在媒体上看到他应萨科齐总统的邀请，为 21 世纪巴黎的建设提供规划建议，知道他还在积极创作。对我来说，始终难忘他在北京看到一个电灯开关装歪时气愤的脸色。

格鲁姆巴的批评在我脑中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开始理解到建筑师的职业建设不仅与建筑实践，而且与建筑学理论建设不可分割。特别是 1994 年国际建协执行局决定成立建筑师职业实践委员会，并委任美国和中国的学会担任联合书记，我被中国建筑学会委任为中方代表，加上当时我正参与建设部建立注册建筑师制度的工作，以致在整个 1990 年代，我的主要精力就转到建筑师的职业建设上。1995 年我国国务院总理签署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1999 年国际建协第 21 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职业实践委员会起草的国际建协《关于建筑实践中职业主义的推荐国际标准认同书》（相当于建筑师职业的国际标准）。我高兴地看到建筑师的法律和社会地位在中国和国际得到公认（本书有专门一节叙述建筑师的职业建设问题）。

1999 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建筑师大会和国际建协代表大会之后，我（当年 68 岁）正式辞去了国际建协职业委员会联合书记（由许安之教授接任），并卸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的职务（中国科协已多次就我超龄后仍“赖”在这个职务表示不满）。此前，我已在 1994 年办理了国家干部的离休手续，从此，以我的“自由身”，我可以有更多时间学习、思考和写作。我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建筑历史和建筑师业绩等方面，在国内和境外若干出版社的支持下，先后写了《特色取胜——建筑理论的探讨》（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跨文化建筑——全球化时代的国际风格》（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年；香港商务印书馆，2009 年）以及《中

国古代建筑师》（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香港三联书店，2012年）等书，阐述了自己的一些学习心得。

2011年，香港建筑师学会授予我名誉会员的称号，我作了《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的三大源泉》的报告（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这可以说是我对中国建筑史学习的一个总结。

在本书中，我将分别就建筑学的理论－历史－人物（建筑师）－职业等四个方面写一些个人的认识，有的认识可能是“离经叛道”的，只是提供批判。如果，一个“檻外人”的看法能对“檻内人”有所启发，则于心满足了。

张钦楠

2012年7月

第一章 理论

第一节 建筑是什么？

所有建筑理论的书开头总要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建筑是什么？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根本问题。人类为解答这个问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取得过巨大的收获。

或许有人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庸人自扰。因为你随便问一个老百姓：建筑是什么？他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房子”。

但是如果那座房子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门外的树丛和草地（也许还有池塘或小河），室内的家具、陈设和墙上“全家福”的照片……这“房子”就有了特殊的意义，这是他的“家”。

而那些建筑理论家，却喜欢把建筑的概念分为两种：一是“建筑物”（building），讲的是建筑的物质组成；二是“建筑学”（architecture），物质之外，还加上精神因素。

其实，老百姓所说的“房子”，就相当于理论家所说的“building”；而“家”，则相当于“architecture”。*

我在拙作《建筑设计方法学》[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清华大学出版社（第2版），2007年]中以三个功能层次叙述自己对“建筑是什么？”的理解，现摘录于下：

* “architecture”一词在中译时始终没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汇。在本书中，当涉及理论时，译为“建筑学”；当涉及实物时，译为“建筑”。

……在本书中，拟按照 H·A·西蒙提出的“近可分解性层级系统”的概念，把建筑物（或建筑群）视为一个系统，并分解为三个层次：

掩蔽物 (shelter)：

产品 (product)：

文物 (relic)。

在某种程度上，这三种层次也反映了建筑的发展过程。

建筑作为掩蔽物，是它最原始、最古老、最基础的功能。以周口店北京猿人的穴居开始，建筑最初级的功能要求就是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性，包括防风、挡雨、防止野兽侵入等。这种掩蔽要求一直延续下来。唐朝诗人杜甫（712—770 年）向往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的标准也只是“风雨不动安如山”而已。直至今日世界，按照联合国的统计，至少还有 10 亿左右人口为“无掩蔽户”^{*}，说明对相当一部分的人来说，“掩蔽物”仍然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

当建筑仅仅满足掩蔽要求时，它通常被视为一种社会消耗，一种人类不得不付出代价的负担，一种维持人类本身简单再生产及必要繁殖的需要。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建筑多数属于这种状况。直至近日，还有人把建筑视为“非生产建筑”，仍然作为一项纯支出看待。

在工业社会出现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之后，建筑的功能及性质有了很大的转变。建筑不再是单纯的掩蔽物及社会支出，它和其他工业产品（机器、化肥）一样，积极地参与社会财富的扩大再生产，用现代的词汇来说，它通过满足除了掩蔽之外的多种功能需要，为社会创造了经济、社会及环境效益。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建筑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它的盛衰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或停滞起着倍加

* Darshan J.UN: Shelter for All: The Role of Housing Policy in Implementing the Habitat Agenda.UN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s, 1988.

的影响。

在前工业社会中，建筑物的费用（消耗、支出）绝大部分体现在一次建造之中，但是，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中，建筑物为了满足多种使用功能要求，增添了采暖、通风、空调、供水、排水、照明、电梯、电话、网络等各种设施。这些设施及整个建筑物在建成之后的经常运行及管理，需要有相当大的费用支出。在国际能源短缺的形势下，这种经常性的支出往往要高出建筑物一次造价，甚至高出几倍。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师的任务就不限于研究如何节约一次造价，还要把包括建筑物投入使用年限长期支出（即“全寿命费用”——life cycle cost，简称LCC）与它产生的收益相比较，以期达到最佳的产品效益。这就使建筑设计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建筑从一开始（包括周口店式的洞穴）就反映文化、反映社会（或社团）的生活模式及思想意识（如图腾崇拜等）。早在杜甫向往“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掩蔽物之前的1000多年，周室王族就对自己的宫室提出了“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翬斯飞”（《诗经·小雅·斯干篇》）的形象要求。建筑与文化的相互渗透，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中。但是，长期以来，建筑的文化反映（包括艺术表现）往往是个人有意识的创作与集体无（潜）意识的创作相交杂的。前者往往只是体现在少数的高级建筑（神殿、宫廷等）中，而后者则以传统的方式出现在量大面广的普通建筑之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有意识的个人创作逐步上升，原因如下：

（1）城市的发展以及行政管理的加强，使大部分城市建筑的设计由得到许可的建筑师及工程师承担，这种做法也扩大到许多农村；

（2）人们生活越加走向社会化，各种社会交往的增多缩短了人际距离，从而不断产生新的群体心理反应，这就促使建筑师更多地转向各种人文学科，以寻求更好的社会效益；